

## 在美国做出庭律师

作者| 印庆余

我赤膊光脚、穿开裆裤在村里跑的年岁，根本不会去想三十年后我会是什么样子。祖祖辈辈单一的生活方式，也确实没有什么好想的。

小学四年级，因为一个偶然机会，被选拔参加华罗庚金杯数学邀请赛。校长跟我打赌说，如果我能拿到名次，就送一块匾到我们家。结果我拿了县里第一名。后来的风光场面村里人应该至今只见过一回：校长领着全校师生，几百人浩浩荡荡、敲锣打鼓，穿过整个村庄，整齐列队在我家屋前的菜地里，听我爸介绍教育经验。随后县教育局局长决定破格录取我到县城的重点中学。

这样的辉煌，爸妈、村里人一直津津乐道。我自己也当然不会忘记，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：一个懵懵懂懂的农村孩子看到了外面的花花世界，突然知道还有种田之外的事情可以做。

但是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，也没有人告诉我将来应该做什么。因为数理化好，高中自然进了理科班。考大学时随大流报了电子，进入清华电子系。五年后又随大流到美国留学，进入耶鲁大学。

耶鲁的前两年，轻轻松松上几节课，做点作业，朋友聚会野炊、玩拖拉机，就过去了。第三年，努力一下，过了博士资格考试，接下来是实验，论文。大量、大量重复性的实验。基本上就是将仪器参数设好，按按钮开始；等两个小时，测试结果，调整参数，再来。脑子处于机械状态。老婆戏称为洗衣机工作。这时候我才开始想：我要洗一辈子衣服吗？

再三考虑之后，决定毕业后读法律，做律师。

命运会眷顾有准备的人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：就在我考虑做律师时，一次家庭聚会上碰到了一个亲戚，聊起我的想法。他刚好是律师，跟我说，你不如到我们事务所来。我说好啊。就买了一套西装，到飞翰面试。然后飞翰给我来信，录用了我。我辞掉了洗衣机的事情，潇洒地跟导师握握手，离开了耶鲁。这时我博士已经读了四年，距离毕业还有一年。

到飞翰之前只知道这是一家律师事务所，但没想到是一家知识产权事务所，更没想到是业界最顶尖的事务所。我对知识产权一无所知。刚刚加入事务所时，一个合伙人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给我介绍基本业务。他拿出一份专利，问我以前见过专利没有。我讷讷答道没有，开始担忧我在事务所的前途。有同事怀疑我的能力，因为我是通过裙带关系进来的。有一位律师直截了当问：事务所是因为你会讲中文才招你的吗？

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，我这第一份工作一做就是十二年。我从基本的事情做起，申请专利，撰写说明书，诉讼案件打杂，读了法学院，拿了 JD。除了法学院，

每件事情我都非常享受、非常认真地去做了，得到了同事的肯定和好评，在事务所的声誉也渐渐确立。虽然我没有读完博士学位，清华和耶鲁的九年还是给了我相当扎实的理工基础。对技术的掌握我都是团队最突出的。理工背景也同样为法律问题的分析、文书的撰写提供了严密谨慎的逻辑推理。我的诉讼越做越顺手。

我的职业目标其实一直是很明确的：我不要做诉讼团队的配角，我要做出庭律师。当初考虑未来时，是 Tom Cruise 的电影《A Few Good Men》让我决定做律师，而且就要做那样的庭辩律师。电影里 Tom Cruise 扮演的海军律师丹尼尔在一个谋杀案件中代理两个海军陆战队队员。本来应该和解的案件，由于被告和 Demi Moore 扮演的海军少校激将，丹尼尔决定上庭；由于少校缺乏实际法庭经验导致重要证人推翻证词，另一目击证人又迫于压力自杀，本来一片大好的法庭形势急剧下滑，陷入死地。案件此时应该告终，但是丹尼尔坚信事实在自己这边，冒极大风险宣海军陆战队上校作证。这样一场注定会失败的较量，丹尼尔斗智斗力，通过无懈可击的逻辑以及心理战术，迫使上校当庭承认罪行，扭转案件局势。

电影的戏剧性在现实生活中偶尔也会发生。我在庭审过程中也曾亲身经历过在证据不利的情况下，发现对方证词的漏洞，迫使证人当庭承认了至关重要的一点，并因此赢得案件；也时有一步一步诱导对方证人推翻自己的证词的情况。但是更多时候庭审是按预期进行的。前期海量的准备工作就像电影里介绍的，需要整个团队不分昼夜地整理文案、讨论策略。庭前精心设计法庭问题和预期与对方律师可能的辩论，是最让我有激情做的事情。

我从十二年前完全不知道专利为何物，到后来在重大案件里担任主要庭辩，再后来独当一面出任首席律师，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绝大部分律师。挡不住的运气是一个重要因素，其中经历和越过的坎也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。

在代表 HTC 打美国苹果公司的一个案件中，我去加州向苹果证人取证。晚上在酒吧恰好碰到一个比我加入飞翰还早的同事。他很惊讶我在负责诉讼，饶有兴致地跟团队其他律师讲，我在加入事务所的时候，他根本听不懂我说话！

谢谢他等了快十年才说这话，否则我的律师生涯可能会早早夭折。在他说这话之前的那些年，我寻找一切机会锻炼自己的讲话能力。我请事务所聘请演讲老师，给我训练讲话的基本功；我找到 DC 附近的一个专门为律师培训的机构，上了两个月的表演课，学习发声的技巧和表演的艺术；我工作过程中经常用录音机给自己录音，锻炼说话能跟上思维。法学院模拟上诉法庭，我表现最佳。美国国家庭审辩论研究会（NITA）开设的高强度模拟法庭，我给陪审团的结案陈词为当事人获得全胜，在十几组里最好。

如何让人相信，一个黄皮肤、三十来岁的外国人，能在美国法庭与花白头发、二三十年经验的白人律师抗衡，是一个很难跨过去的坎。成见让我失去了很多机会。我曾经气馁，但没有放弃。我努力在每个诉讼案件中成为最为核心的力量，也确实都做到了。在一个重要诉讼案件中，我做到对案件的所有关键点、所有细节了然于胸。无论是团队合伙人还是客户，都意识到我的价值，认为我是上庭辩论的不二人选。为期七天的庭审，双方平分庭审时间，我站在庭上差不多两整天。让

我骄傲的，除了上面说的戏剧性证词外，是我的对手<sup>3/4</sup>真的是花白头发、执业二三十年的白人律师。我们因为三个关键的证据问题，激辩两小时，并且一度有两个资深律师同时与我对抗。三个问题我全赢了。当时我法学院毕业刚刚四年多，但已经不再是一个只会讲中文的律师了。

有些新进事务所的中国律师问我，如何才能有机会做高端诉讼业务。我的回答通常是：耐心。要从基本功练起，勿以事小而不为。不要去寻捷径，因为没有捷径可循。投机取巧、小聪明、争抢不属于自己的功劳可能会暂时带来荣誉，但无法长久。堂堂正正地做事，安安静静地积累、沉淀，真正具备了实务上的竞争力，才可以赢得同行的尊重，机会才会找上门来。

专利申请，说明书的撰写，案件里的各种杂务，不要轻视了，一点一点踏踏实实地做。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，基本的事情没有做好，是没有可能自如地处理诉讼里复杂的问题的，更不可能带领一个团队。旁观者看到庭上短暂的表现，很精彩很潇洒，却看不到庭前准备的昼夜无眠。达到那个潇洒的境界，如果需要十年的准备，那就给自己十年好了。

保持对工作的兴趣很重要。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讲，我在飞翰这些年 95%的时间是很开心的。他震惊，表示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人。我想我没有什么秘诀，只知道当时是因为强烈的兴趣进入这一行的，这兴趣至今没有减退。失去兴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就像当时我对洗衣机。很庆幸当时决定离开，虽然很多人跟我讲放弃耶鲁的博士学位很可惜。但是我找到了我喜欢做的事情，其它都无所谓了。况且，从名校退学，不也够我显摆了？

理工出身对于专利诉讼律师其实是一把双刃剑。技术能力和逻辑思维似乎是与生俱来，可以很快看到案件里问题的实质和辩论的漏洞。但是以工程师的思维方式和一腔热情解释专利技术给团队、给陪审团、给法官听，可能只能换来一脸的茫然。工程师面对茫然可以轻蔑地转身，但是律师不行。专利诉讼律师需要一直努力做的，是在深度掌握了技术之后，跳出技术的束缚，用路人甲都听得懂的白话说出争议的重点，得到陪审团的恍然大悟，法官颌首。无忌向太师傅学太极剑，先学再忘而后战，好像就是这个意思。

这些建议跟一些我后来的华人律师讲过，希望对他们有帮助。经历是财富，不光是工作中的成功，也有工作中的挫折。在白人为主的圈子里，第一代华人要获得成功，需要付出很多倍的努力。这些困难和经历白人可能不会理解，但是我们宝贵的经验让我们懂得如何克服大家都会面对的困难，帮助后来人进步。实实在在提高华人在美国律师界的层次和地位是我们的职责。

一点题外话。当上合伙人之后，事务所照例召开招待会，每个新合伙人做演讲。我的演讲结束后，无数人过来感叹我的演讲精彩，包括从来不服气的老婆。最为夸张的是，一个高级合伙人跟我讲：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去竞选总统了！我笑笑，没有回答，心想这愿望只能等儿子去实现了。

但是九岁的大儿子，学习随随便便，丝毫没有想要上进的意思。我决定给他励志。

一天天气好，拽着他出去散步。我从农村生活回忆起：没有电，靠洋油灯照明；去河里井里挑水，身高只将将够把水桶挑离地面；下雨天漏雨，家里的盆盆罐罐不够接水。再说到我的数学竞赛，校长打赌，然后进入了重点中学、清华、耶鲁。然后，再然后，才有现在的生活，小时候完全无法想象的生活。回顾了一个多小时的辉煌经历，我问儿子长大了要不要象老爸一样。他没有回答，反问：你数学这么好，为什么没有找一份数学的工作？

这小子。

### 作者简介：



印庆余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、耶鲁大学电子工程系和乔治城大学法学院。做律师从事专利诉讼多年，2013年在 Nuance 诉上海汉翔公司案（国际贸易委员会 337 调查案）中担任上海汉翔的首席辩护律师，通过取证和动议瓦解了 Nuance 的绝大部分诉求，并为汉翔获得了对 Nuance 三个主要专利不侵权的速裁判决，成功在庭前和解纠纷。汉翔获得了有利的和解条款，保证了汉翔在美国市场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害。此前他曾主持 HTC 诉苹果的几个 337 调查案，并曾任法庭主要辩论律师，对于与中国企业合作去应对美国的专利诉讼有着非常深厚的经验。